

德语圈民俗学的日常学化——过程与意义

及川祥平

OIKAWA Shohei

Christian GÖHLERT

翻译·施尧

序言

近年来，日本的学界对德语圈民俗学的现代文化研究，尤其是这种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概念“日常”呈现出浓厚的兴趣。笔者认为，这种关注正体现出了民俗学家作为生活在现代的生活者，却没能很好地将其自身的“现在、这里”进行对象化的问题意识。

本文为Christian Göhlert与及川祥平根据搜集调查的成果，将德语圈中引入“日常”这一概念的趋势称为“日常学”化并介绍其发展情况。之后，本文将根据上述问题意识，进一步探讨日本民俗学在将“日常”作为核心概念时，可以展开怎样的研究和讨论。

1 德语圈民俗学中“日常”概念的历史

如李相贤、户晓辉等已详述，德语圈民俗学中所使用的“日常”概念不是民俗学独有的，它基于埃德蒙德·胡塞尔和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现象学，尤其是生活世界概念之上(李 2015; 戸 2015)，除此之外，还有受到昂希·列斐伏尔影响的学派。

民俗学界在1969年法尔肯施泰因(Falkenstein)年会之后，在民俗学改革的浪潮中引入了上述的“日常”概念。尽管如此，Utz Jeggle在1978年出版的《民俗学概论》一书中提出，民俗学本就有“日常”的指向性，只是在学科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远离了“日常”(Jeggle 1978:85)。因此，德语圈民俗学的“日常学”化，既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也可以理解为重新找回民俗学学科方向性的过程。所以，在如今的德语圈民俗学界，与其把“日常”看成一个新鲜的理论，不如认为它是体现出学科基调的概念。Konrad Köstlin用“长时间燃烧的火炉(比喻长期的现象)”来形容作为概念的“日常”，认为学者们用“日常”取代了“民俗文化”(Volkskultur)(Köstlin 2006:19)。当然，我们不赞同仅仅置换了对象的用法，但不管怎样，可以认为在德语圈中“日常”已被看成是与学科本身的性质紧密关联的概念，并逐渐稳固了其作为关键概念的地位。

据Calora Lipp考证，德语圈民俗学中最先使用“日常”一词的单著是1978年Ina-Maria Greverus出版的《文化和日常世界》。在此之前，Greverus曾在1976年向《民俗学杂志》投了论文《有关文化和日常世界》。当然，更早以前也有学者用过“日常”或是类似的词语，但直到1970年后半开始，才自觉地把它作为概念使用。而到了1980年代，“日常”的使用便在研究者中普及开来。

如本文开篇所强调，70年代对于“日常”的瞩目不仅仅是民俗学单独的动向，而是一股跨学

科性的潮流。阿尔弗雷德·舒茨在1950年代建立了现象学社会学，但直到柏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的《现实的社会结构》一书出版之后他才被重视起来（バーガー／ルックマン 2003）。《现实的社会结构》1966年在美国出版，1969年被翻译成了德语。此后，舒茨的著作在1975年被翻译成了德语。另外，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出版于1946年和1957年，但直到1975年才被翻译成德语（Lipp 1993:3-4）。

值得注意的是，法尔肯施泰因年会后的民俗学改革时期和德语圈内跨学科的对于“日常”的瞩目处于同一个时期。同时，在这个时期，德语圈民俗学正在向社会学研究靠近。不过，“日常”并不是其靠近社会学的方法。Jeggle认为，“日常研究”是连接社会学和民俗学的桥梁，同时也是连接民俗学内部日渐分离的历史学研究和现代学研究的桥梁（Jeggle 1978:86）。所以，“日常”作为一个可以融合多种民俗学研究，且重新连接相邻学科的术语受到了广泛瞩目。

这点也在法尔肯施泰因年会后的大学学科改革中对于“日常”的重视程度中得到印证。尤其 Greverus 所属的法兰克福大学，以及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和 Jeggle 所在的蒂宾根大学便是重视“日常”概念的学派。下面将重点介绍 Greverus 和 Jeggle 的“日常”观。

Greverus 把民俗学定义为“研究欧洲人日常生活世界的学问”，把文化定义为“生活的方法（Mittel der Existenzbewältigung）”。刚开始，Greverus 曾显现出把文化和“日常”同义化的倾向，比如他将“文化分析”换言之成“日常”研究（Greverus 1976）。但后来他把“日常”和文化作为一个对比来看待。Greverus 认为“日常”不是人们积极形成的，而是由文化产业（Kulturindustrie）制造出来的，与此相对，人们积极形成的才是“文化”。她的课题是论“日常世界（Alltagswelt）”的经验可能性，即考察人们如何接受“日常世界”，人们与“日常世界”的相互作用性。Greverus 关注着逐渐扩大影响力的社会学中“日常”的研究，并于1983否定了“‘日常’可以与其他文化区别开的观点”和“所有事物皆是‘日常’的观点”（Greverus 1983:11）。也许正因如此，她在法尔肯施泰因年会上反对把民俗学看做是“研究下层人们日常的社会学”的看法。Greverus 所说的“日常”，指的是在人们生活的外侧产生作用的事物，并不等同于“司空见惯”或“理所当然”。

另一方面，蒂宾根大学学派则不认为“日常”是由文化产业制造出来的，相反，它是由文化产业所排挤开的事物。Jeggle 在民俗学史中寻觅“日常”研究的开拓者，他参考1980年 Karl Weinhold 的衣食住研究，形成了重视物质性的文化观。他所属的蒂宾根大学所开展的“日常”研究也以物的研究为中心，未对间主观性构筑成的生活世界做探究。Jeggle 认为胡塞尔、舒茨以及列斐伏尔等的“日常”论和民俗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创造出经验文化学（笔者注：即民俗学）可以使用的日常概念”（Jeggle 1978:83）。可以说，尽管身处相邻学科领域的潮流之中，但他并不是把“日常”当做流行的理论来使用，而且站在民俗学的立场上进行创造性的接收。Jeggle 之后，这个研究方向发展为研究工人的文化和社会阶级等课题。Albrecht Lehmann 对工人阶级所做的研究便处于这个脉络之中。另外，比起 Greverus，蒂宾根大学学派更重视历史性的研究。蒂宾根大学的民俗学在70年代前曾作为媒体研究的重镇（ベヒドルフ 2015），之后历史性的题目变得更强。

这股对“日常”瞩目的潮流也给德语圈民俗学带来了不少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人”的中心化。很多学者开始关心个人的创造性、人们的濡化等问题。当然，德语圈民俗学一直以来就以“研究人的学问”自居，但也仅仅将人看作为文化的保持者，这点在引入‘日常’概念后发生了很大转变。比如，从前的物质文化研究一直以“物”本身作为研究中心，但是“日常学”的物质文化研究开始关注物对于个人以及个人生活的意义（Lipp 1993:12-14）。Lipp 在区别从前的研究方法与“日常学”的研究方法时这么说道：“即使我们调查再多的收纳箱、橱柜、衣柜也无法弄清楚‘日常’是什么”（Lipp 1993:13-14）。

对人的关注也催生了传记分析等研究方法，同时学者们也开始反思研究者本身在调查中发挥的

作用。这不是民俗学单独的潮流，和社会学、历史学也有着联动。例如，80年代前期，历史学中火热的口述历史研究，民俗学和历史学采用“人类学方法”即重视主位(emic)视角的民族志。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民俗学的学生数量也在增加。Lipp认为这与同时代自文化批评的高涨不无关系(Lipp 1993:12)。总之，民俗学的“日常学”化有助于使其脱离古色古香的学科形象，以文化学的姿态再获新生，这种民俗学的发展也吸引着更多普通人的兴趣。

但是，民俗学在上述这股跨学科潮流中“日常学”化的过程也不是一路顺风顺水。在Lipp于1993年发表的论文《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的境界领域中的日常文化研究》(该文常被作为德语圈民俗学中探讨“日常”概念时的基础文献)中，他把民俗学的日常文化研究放入学史以及相邻学科的对比之中做了整理。Brigitta Schmidt-Lauber认为我们在解读Lipp的这篇论文时，有必要先理解当时有关“日常”的诸多相邻学科中民俗学所处的境况，尤其是民俗学者感受到的来自历史学的威胁(Schmidt-Lauber 2010:47)，也就是说，历史学的“日常学”化给予民俗学以一种危机感。Lipp便是在这喧嚣的讨论中写了这篇论文。

综上，“日常”概念的引入对德语圈民俗学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从跨学科层面上来看，民俗学的“日常学”化带来向社会学、历史学的靠近，同时也引入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而从民俗学内部来看，它在过去指向的研究和现代指向的研究之间充当了桥梁的作用，乃至学者们期待它可以成为融合两者的概念。这种期待也一直延续到现在。在2010年，Schmidt-Lauber有过如下发言(Schmidt-Lauber 2010:56)。

历史研究和现代研究，抑或，共时的文化分析和通时的文化分析，如果这之间存在连接彼此的“纽带(Klammer)”，那“日常”便是其中的一个。不，可以说它就是纽带本身。民俗学的“日常”研究，不管是将现代作为对象还是将过去作为对象，都采用了微观的分析和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很多情况下也都伴随着聚焦主体的研究方法。

由此可以看出，德语圈民俗学至今仍在谋求着“纽带”发挥作用。尽管还有着需要融合的问题，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可以看到“日常学”化提升了德语圈民俗学的社会地位。Schmidt-Lauber说“从前说自己是民俗学家时，总是被示以同情的微笑或是悄悄地被告知对方有着共鸣”，但是，现在的民俗学作为“日常学”(或者文化学)受到社会广泛的认知和关注(Schmidt-Lauber 2010:53)，很多学者都对“日常学”化给民俗学带来的影响给出积极的评价。

以上对“日常”概念被引入德语圈民俗学的过程以及其带来的变化做了概观，下面将讨论“日常”概念作为分析视角的意义。

2 作为方法的“日常”

上文已经提到Greverus和Jeggle有着不同的“日常”观，事实上，在德语圈中不同的学者对“日常”有着不同的解释，且这种不统一的使用状况也常为其他学者诟病。有的学者单纯地将研究对象称之为“日常”，也有的学者探讨的“日常”是社会关注的对象。即便是后者的“日常”，也没有超出“普通人的生活世界”的含义(Schmidt-Lauber 2010:50-51)。不过民俗学家们的兴趣点是：因为聚焦了社会的关注，“日常”成为了非“日常”。

奥地利民俗学会2004年度年会论文集集中收录了Konrad Köstlin的论文《作为欧洲民族学课题的日常》，文中，他把这种“日常”的消失作为民俗学的基础立足点。下面我们从这篇论文的观点出发，

讨论“日常”作为方法论的可能性(Köstlin 2006)¹。

Köstlin认为“日常”有着难以被认知的特性。“理所当然(selbstverständlich)”意味着人们无法看到其中的问题。一旦“日常”被作为一个对象摆上台面,那么它的“理所当然性(Selbstverständlichkeit)”也就随之消失了。

Köstlin讨论的重点在于,一直以来民俗学都把“理所当然性”的“消失”作为其存立的基础。传统的民俗学旨在于分析失去了“理所当然性”的“日常”。研究对象被置入消失、衰退或解体的过程中,在社会中变得可见,被称为民俗文化或历史共同体,或作为怀旧的对象,发掘出地域的“特色”,或成为消费的对象,或作为爱国心、爱乡心的凭依成为一个象征。笔者认为,整个日本民俗学界也符合这个情况。再者,在日本的田野工作中,作为生活者的研究者往往选择对其自身而言“理所当然性”比较稀薄的生活事象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对信息提供者而言,只有“理所当然性”已经衰退了的过去的事情才能在采访中讲述。

因此,Köstlin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文化在急剧变化,越发地片段化、多样化,所以事物的“理所当然性”也更容易消失。也就是说,在当前的社会中,不易被认识到的“日常”很容易失去其“理所当然性”从而变得可见。Schmidt-Lauber也指出现代社会中“曾经作为惯例实践的日常生活正在不断消失”(Schmidt-Lauber 2010:50-51)。某人的“理所当然”很可能对另一个人来说不是“理所当然”,10年前人们的生活放到现在已经不是“理所当然”了,这样的例子想必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随着社会多样化、片段化的加剧,个人或集团往往需要对其他个人和集团说明和解释自己如何吃饭、穿衣,使用何种家具,在生活的诸多选项中如何做出选择,抱有什么想法等。不仅有说明的必要,有时也会生出摩擦和纠纷。提倡张扬自身个性的风潮也与此相关。个性在人与人的交流中给予个人以满足感,有时也有着经济或社会意义。这样,过去“理所当然”的事物,也便可能作为一种特别的、独特的事物,被应用于与他人差异化的过程中。

Köstlin举了讷德林根市(德国)和德罗森多夫市(奥地利)结为兄弟城市的事例。两座城市都是要塞都市,在城墙之中生活这一过去“理所当然”的生活,被重新看作为城市的特性,以此发展出了同样拥有这种特性的多个城市间的交流。也就是说,如今这个需要在与其他人事物进行比较中说明自我的社会中,自己的“理所当然”常被重新发现为不“理所当然”的事物。除此之外,所谓“记忆崇拜(erinnerungskulte)”的现象也是“日常”被社会资源化的突出例子。如Wurstsemmel这种在奥地利满大街都有的三明治以国民食物或灵魂食物的形式被强调为国家或地区的象征。也就是说,从日常之中截取出来的事物被重新讲述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由此个人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被结合了起来(Köstlin 2006:27)。我们很容易便能想起日本民俗学中也把掌握“地域性”作为长久以来的课题。另外,近代以来国民性文化的创造或提倡原有文化的现象也是日本民俗学常见的题目。

如果我们认同民俗学是基于“理所当然性”的消失现象而形成的学问,那么在这个一切文化的“理所当然性”都很容易失去的现代社会中,民俗学应拥有着无比广阔的田野。民俗学的研究实践也是把“理所当然”的不可见性进行可见化操作的行为。如前文所述,“日常”在被注视的瞬间,便从“不可见”的事物变成了需要描述的特殊的事物。Köstlin称这个过程为:“日常”转变为“文化”(Köstlin 2006:24),他的这个描述与德语圈民俗学以文化学看待自身相关。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把“日常”看做为对于人们而言具有前意识性的现实或其感觉的方式,那么,作为对象的“日常”便是蕴含主题化的可能性却仍未被主题化的整片领域。同时,探讨“日常”的研究实践是在研究者认知可能性的境界线上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常”犹如一片“未知大陆”(引自德国汉堡大学2011年冬季学期的Sabine Kienitz、Sonya Vindmøller的课程《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导论》的课堂讲义“概念与理论:日常”,详细请参阅(及川 2014))。我们民俗学者作为“生活者”在自文化研究的田野中生活。对于作为日常学的民俗学而言,与很多民俗学家苦心经营田野的融洽关系逐渐受到接纳的地域社会一样,

我们的“现在、这里”也与田野具有同样的价值。

基于以上对于“日常”的理解，Köstlin把说明“理所当然性”的结构与“理所当然性”消失的过程作为民俗学的课题。笔者认为，这其中还可以加上事物转变为“理所当然”的过程。从这里对过程的重视也可以看出Köstlin对民俗学的“历史学性”的重视。尽管德语圈民俗学把现代社会的都市空间和科学技术世界作为主要的田野，但Köstlin认为民俗学之所以可以解读现代社会的都市生活，正是得益于它长久以来把“从前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历史。为了发现现代社会的“理所当然”中的不“理所当然”，需要一些积累和素材，而长期从事生活研究的民俗学在这方面有着深厚的研究积累。所以，正因为“现代民俗学”是“现代”的民俗学，即把“现代”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和其他的民俗学研究相区别的指标，就注定了它需要是历史学性的。如果为了突出“不研究近代以前的事物”，或者为了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有相近的研究方向，就简单地自称为“现代”是缺乏概念性思考的。河野真曾对近年来日本民俗学中的“现代”热表示疑虑，他对民俗学家所称的“现代”的实际内容提出疑虑(河野 2014)。因此，我们还需要更多把“现代”作为分析框架的讨论。

3 日本民俗学与“日常学”

基于以上的讨论，我认为如果日本民俗学要向“日常学”化发展，或者民俗学想有意识地锻炼已经有的“日常学”的视角，特别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无计划地使用“日常”这一概念(例如把学科的研究对象单纯地置换为“日常”的操作)是非生产性的。“日常”不应该只是笼统地把研究对象包括进来，而应成为民俗学为了有效地理解某种现实而采取的方法论立足点。

第二，“日常学”不能单纯地等同于现代学。Jeggle、Köstlin、Lipp、Schmidt-Lauber这些“日常”论的学者在构想“日常学”的同时也都一贯地重视历史学性的研究。Schmidt-Lauber就曾批评民俗学过于偏重现代文化的研究，并指出：那种认为民俗学自我形象的“经验文化学”的“经验(Empirie)”这一概念仅仅意味着对现代进行文化分析的想法还为时过早(Schmidt-Lauber 2010:55)。如前文所述，德语圈民俗学界期待“日常”能够发挥“纽带”的作用，那么日本在对“日常”概念精细化时，不应该重新在日本产生出这种在德语圈被认为需要统一的分裂。

第三，需要注意的是“日常学”不仅仅只是民俗学。毋宁说“田野调查”“民族志”这样的研究方法，就连“文化”“民俗”这样的词汇也已经不是民俗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性了(Schmidt-Lauber 2010:57)。现在已经无法将学科的认同置于一个研究对象或一个方法上了。

那么，在与相邻领域的界限逐渐模糊化的情况下，如果仍想让学科的轮廓更清晰一些，就更应该重视学科积累的历史。现在的民俗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民俗学一直以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民俗学一直来自称为乡土研究、自我省思的学问，同时构想着将来能有世界范围内融合的愿景，发展成为一门研究自文化的学科。这段学科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正是在因社会、经济、政治的原因，自我生活的“理所当然性”急速地动摇的体验之中，民俗学被设立为自文化研究的学问。另外，过去的“理所当然性”曾被看成是理想生活的阻碍，有着需要民俗学将其对象化、可见化，进行反思性思考的战略(室井 2010)。当然，以前的学科历史中有多少可以让日本民俗学作为“日常学”之一的积蓄，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余地。

最后，需要注意在多样化中的社会中，作为生活者的研究者的“理所当然性”也是多样的。对于把观察和采访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的民俗学，如果把“自己”作为最基本的研究工具(Schmidt-Lauber 2007)，社会的多样化也带给了各个研究者认为不言自明的事物的多样性。每一天，“理所当然性”

如何松动，什么被作为非不言自明的事物而浮出水面，这些都因人而异。日本社会因为生活的急速变化，不同世代的研究者之间的现实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新谷 2009:71）。即便同世代的研究者之间，因每个人的嗜好和生活经验的不同，看成不言自明的事物也很多样。在民俗学的调查中，研究者的身体与调查数据呈现函数相关这一点已经被很多研究者提过，这与其说是在调查、分析时需要注意的事项，不如说其中蕴含着将作为生活者的“自己”作为一种方法而升华的可能性。

结语

本文介绍了德语圈民俗学的“日常学”化的过程以及其中看出的意义，并且将其与日本民俗学相联系做了讨论。民俗学考察自文化与社会中“理所当然性”的动态相联动。并且，社会生活中，“理所当然性”的动态正在加速，“理所当然”正呈现多样化、细分化，这为民俗学提供了拥有无比广阔的研究课题的田野。

上文已经提到并不是只有民俗学是“日常学”。但是，笔者认为在诸多学科中，只有民俗学可以极其“日常学”性，也必须是“日常学”性的。

注释

- 1 或许有人会觉得如何理解一个概念不属于方法论，但是，选择理解对象的框架也是研究工作的过程。本文
- 将视角的选择也视为一种“方法”，且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而言，“日常学”在这个意义下才更有建设性。

参考文献

【日语文献】

- 李相賢 2015 「ドイツ民俗学と日常研究—ドイツチュービンゲン大学民俗学研究所の村についての日常研究を中心に」『日常と文化』1号
- 及川祥平 2014 「ハンブルク大学民俗学／文化人類学研究所における民俗学教育について」『常民文化』37号
- 河野眞 2014 『民俗学のかたち—ドイツ語圏の学史に探る』創土社
- 新谷尚紀 2009 「いくつもの民俗学のなかで、いまあらためて柳田國男の民俗学に学ぶ意義、その実践」上杉富之・及川祥平編『歴史としての人類学・民族学・民俗学』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
- バーガー、ピーター・L／ルックマン、トーマス 2003 『現実の社会的構成』（山口節郎訳）新曜社
- 戸嶋輝 2015 「民俗学における『生活世界』概念の『当たり前』についての再考」（西村真志葉訳）『日常と文化』1号
- ベッヒドルフ、ウーテ 2015 「ドイツ語圏における民俗学的・文化科学的メディア研究の方法—映画とテレビ」（及川祥平、クリスチャン・ゲラット訳）『常民文化』38号
- 室井康成 2010 『柳田国男の民俗学構想』森話社

【欧美元献】

- Greverus, Ina-Maria, 1976, "Über Kultur und Alltagswelt", *Ethnologia Europaea* IX, 199–211.
- Greverus, Ina-Maria, 1983, "Alltag oder Alltagswelt: Problemfeld oder Spekulation im Wissenschaftsbetrieb",

-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79, 1–14.
- Jeggle, Utz, 1978, "Alltag", In *Grundzüge der Volkskunde*, herausgegeben von Hermann Bausinger, Utz Jeggle, Gottfried Korff, und Martin Scharfe, 81–126.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Köstlin, Konrad, 2006, "Der Alltag als Thema der Europäischen Ethnologie", In *Alltagskulturen. Forschungen und Dokumentationen zu österreichischen Alltagen seit 1945. Referate der Österreichischen Volkskundetagung 2004 in Sankt Pölten*, herausgegeben von Olaf Bockhorn, Margot Schindler, und Christian Stadelmann, 19–33. Wien: Selbstverlag des Vereins für Volkskunde.
- Lipp, Carola, 1993, "Alltagskulturforschung im Grenzbereich von Volkskunde, 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 Aufstieg und Niedergang eines interdisziplinären Forschungskonzepts",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 89: 1–33.
- Schmidt-Lauber, Brigitta, 2007, "Feldforschung: Kulturanalyse durch teilnehmende Beobachtung", In *Methoden der Volkskunde - Positionen, Quellen, Arbeitsweisen der Europäischen Ethnologie*, herausgegeben von Albrecht Lehmann und Silke Göttsch, 2., überarbeitete und erweiterte Auflage, 219–248. Berlin: Reimer.
- Schmidt-Lauber, Brigitta, 2010, "Der Alltag und die Alltagskulturwissenschaft. Einige Gedanken über einen Begriff und ein Fach", In *Alltag als Politik - Politik im Alltag. Dimensionen des Politischen in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Ein Lesebuch für Carola Lipp*, herausgegeben Michaela Fenske, 45–61. Studien zur Kulturanthropologie/Europäischen Ethnologie 5. Münster: Lit.